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MARC HOWARD ROSS

【美】马克·霍华德·罗斯 / 著

冲突的文化

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The Culture of Conflict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刘萃侠 / 译

杨炳霖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丛日云 卢春龙 / 主编 |

MARC HOWARD ROSS

【美】马克·霍华德·罗斯 / 著

冲突的文化

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The Culture of Conflict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刘萃侠 / 译

杨炳霖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 (美) 罗斯 (Ross, M. H.) 著；刘萃侠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0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5198 - 5

I. ①冲… II. ①罗… ②刘… III. ①比较文化 - 研究
IV. ①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6920 号

· 政治文化研究译丛 ·

冲突的文化

——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

著者 / 马克·霍华德·罗斯
译者 / 刘萃侠
校者 / 杨炳霖

出版人 / 谢东旭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姚冬梅 李春艳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谢敏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姚冬梅

责任印制 / 岳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6.75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 251 千字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198 - 5

著作权合同

登 记 号 / 图字 01 - 2012 - 1202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he Culture of Conflict;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es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y Marc Howard Ross

Copyright © 1993 by Yale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年版译出

总 序

丛日云 卢春龙

政治文化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政治学中最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也是成果最丰富的研究领域之一。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系统的心理取向，包括所有与政治相关的信念、价值和态度等。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就是“针对政治对象的取向模式在该民族成员中间的一种特殊分布”，是“内化于民众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的政治系统”。当代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英格尔哈特把政治文化定义为“与一个群体或社会流行的政治信念（beliefs）、规范（norms）和价值相关的所有政治活动”。

政治文化是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在寻找政治因果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解释变量。因而，在西方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英格尔哈特在追溯现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渊源时，曾列举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代表作品和成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阿道尔诺的《威权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拉斯韦尔的《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斯托弗的《共产主义、一致性与公民自由》（*Communism, Conformity & Civil Liberties: A Cross Section of the Nation Speaks Its Mind*）、罗基奇的《开放和封闭的精神——对信仰和人格系统性质的调查》（*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将马克斯·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列入其中。与当代科学化的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种研究在方法论上被视为“非科学的”，但也有其重要价值。在中国，自 19 世纪末起，学者们在讨论中西文化关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也大量涉及政治文化的内容。

布林特教授曾区分和全面梳理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谱系，即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以及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法国的社会学谱系开始于孟德斯鸠，经过卢梭、斯戴尔、贡斯当、基佐以及托克维尔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从社会宏观背景的差异去理解各国政治文化的差异，进而理解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德国的文化哲学谱系开始于康德，经过赫尔德、洪堡、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流派。这一流派强调解释学的传统，强调政治文化并不是对客观社会现实的抽象反映，而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象征、图腾长期积累的产物，强调从解释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历史由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开始于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开创性研究，这一谱系主张通过实证的、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文化，从而克服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弊端，他们在方法论上主张以对各国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调查为基础，进而对各国的政治文化进行精确的科学测量。

当代政治文化研究以美国的政治科学谱系为主流。1956 年阿尔蒙德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1963 年他又与维巴合作出版了《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此为当代科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亦即跨民族的抽样数据研究的开端。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派伊的《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斯里德曼的《人格与民主政治》（*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英格尔哈特的《寂静的革命：变化中的西方公众的价值与政治行为方式》（*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本菲尔德的《落后社会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等。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批评和挑战，许多学者批评它保守、静止、简单，存在文化偏见和文化决定主义倾向，低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作用，不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等。政治文化研究一度走向衰落，退居政治学的边缘。但是，从 80 年代起，政治文化研究经历了从“回归”到“复兴”进而走向繁荣的过程。英格尔哈特在 1988 年最早使用了“政治文化的复兴”这一概念，而后，H. J. 威尔达、阿尔蒙德和布林特等人也肯定了政治文化复兴的到来。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一大批有影响、有重大原创性贡献的成果问世：英格尔哈特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现代化、文化变迁和民主：人类发展时序》(*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与维尔泽合著)，英格尔斯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 A Psycho - Social Perspective*)，尤斯拉纳的《信任的道德基础》(*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普特南的《流动中的民主政体——当代社会中社会资本的演变》(*Democracies in Flux: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ciety*)、《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狄百瑞的《亚洲价值与人权：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达尔蒙德的《发展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等。

政治文化研究关注政治系统的内在心理层面，强调政治文化是决定政治主体的行为准则和支配其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因此，政治文化对于了解一个国家正式制度框架下的政治行为，理解历史上一个国家特殊的发展模式，都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政治文化研究还特别与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研究有密切关系，它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国际环

境、政治战略、政治精英等一起，构成解释一个国家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进程与模式的重要的自主性变量。

政治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国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独特的文明，也是规模最大的文化单元，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政治文化。在当代社会政治转型时期，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在现代化潮流冲击下发生了何种变化？变化的方向是什么？它对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公民文化建设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都需要当代学者作出科学的调查和分析。只有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心理、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的分布状况和变化趋势了然于胸，才能明确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道路选择，才能积极有效地推动传统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型。但是，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仍然以学者的观察、粗糙的文献分析为主要手段，以对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性研究为主要内容，这种研究虽然富于学理性和启发性，但是，没有科学的量化数据为基础，也缺少可操作性，尚不足以为当前政治改革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持。

为了推动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理论和经验，也需要直接引进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学界许多人都在谈论政治文化，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只有零星的译介，大量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于国内学者来说还是陌生的。这是国内政治文化研究长期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政治文化研究译丛》，希望为国内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我们期待着，这套丛书的出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政治文化研究，推动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走向繁荣，贡献出一批与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地位和独特性相称的研究成果。

序 言

卢春龙

《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一书是马克·霍华德·罗斯的代表作，由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与此书同时，罗斯教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姊妹篇《冲突的化解：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这两本书一道构成了他关于冲突研究的基本理论。其中，《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一书更为重要，因为该书详细阐述了罗斯教授关于冲突的基本理论，并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经验事实的支撑。而《冲突的化解：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则体现了罗斯教授的“社会情怀”，他把关于冲突的基本理论转化为冲突化解的基本策略。

罗斯教授自 1968 年至今一直是美国布莱安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政治学教授。他长期专注于冲突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对于冲突化解的意义，并在东非、南非、中东、北爱尔兰等冲突比较激烈的地区从事过实地调查研究。积数十年研究之功，使他成为此领域蜚声世界的知名专家。

除了上述两本书之外，罗斯教授还出版了《种族冲突中的文化争议》、《种族冲突的主要理论对冲突化解的意义》、《分裂社会中的文化与归属：争议与象征性的景观》、《为土地与上帝：以色列犹太人的基要主义》以及《城市寮屋居民的政治整合》。此外，罗斯教授还发表了 40 多篇关于冲突理论的学术论文。这些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大大拓宽了我们对于人类社会冲突行为的理解与认知。

为什么一些社会比另外一些社会有更多、更剧烈的冲突与暴力？通过考察全世界前工业社会的 90 个小型社会，马克·霍华德·罗斯提出了两种基本的理论模式来解释这些社会的冲突行为：基于文化解释的心理文化理论（psychocultural theory）和基于社会结构的结构理论（structural theory）。罗斯认为，心理文化理论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冲突激烈程度，也就是冲突的数量与程度；而结构理论决定了冲突的目标是谁，内部还是外部，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在本书的开头，罗斯就解释了他所使用的“冲突的文化”（culture of conflict）这一概念：“冲突的文化作为一个社会规范、实践和制度的集合——影响着群体或个体为什么而斗争，影响着在冲突中用哪些被文化认可的方式去追求他们的目标。影响着制度性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s）的分配，而这类资源又决定了冲突的进程与结果。”^{〔1〕} 罗斯进一步认为，这些与冲突有关的文化倾向根植于人们早期的社会化经历。在一个人的早期社会化经历中，文化规定了他/她对待社会中的自己与他人的态度和方式。社会化是否充满温暖与爱、教养方式是否严厉、男性性别认同是否存在危机，这都是罗斯所强调的早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罗斯认为，这些早期社会化的因素影响了一个人成长之后形成的文化倾向，进而决定他/她对冲突事件的解读行为。而一个人的心理文化倾向在早期社会化结束之后，就会固定下来，而且会持续终生。

罗斯强调，冲突本质上是一种解读性的行为，心理文化倾向就像是一个过滤器，它决定了冲突中的个体如何解读某个具体事件或某个具体行为，也决定了冲突中的个体如何解读其他人的行为以及断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对于自身的威胁，从而决定了冲突中的个体所采取的后续行为。

但是，罗斯认为，强调心理文化的理论模式并不排斥其他解释模式

〔1〕 见本书正文第 2 页。

的有效性，相反，心理文化理论可以与社会结构模式形成互补关系。这两种理论模式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有效地解释一个社会中的冲突状况。罗斯强调了社会结构理论的两个方面：一个是交叉关系（cross-cutting ties）的存在与否，另一个是社会的复杂性程度。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大量的交叉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社会发生内部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因为大量的交叉关系的存在，使得一个社会很难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忠诚感非常强烈的核心群体，从而把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分散的成员联系起来。但是，交叉关系虽然限制了一个社会的内部冲突，但它有利于把一个社会的成员动员起来，凝聚在一起共同针对外部的敌人，从而把冲突的目标引向外部。社会的复杂性与冲突之间的关系似乎更为复杂一些。罗斯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复杂性有利于控制其内部冲突，尽管这一关系多少显得有些间接，而一个社会的经济复杂性有利于这个社会在外部冲突中取得胜利。政治复杂性也有利于动员这个社会的资源去针对外部敌人。总体而言，一个社会的复杂性有利于这个社会将冲突的目标指向外部。

罗斯的研究数据来自于全世界前工业社会的 90 个小型社会。这 90 个小型社会，无论在地域上、类型上还是文化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从而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罗斯用了专门一章来解释他的自变量与因变量是如何测量的，以及操作和编码的具体程序。通过一系列的多元回归分析，罗斯的诸多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一个社会的冲突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倾向，这一倾向来源于早期社会化的三大因素：社会化温暖与否、教养方式严厉化程度以及男性性别认同是否存在危机。而冲突的目标是由一个社会的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交叉性关系的存在与否与社会的复杂性程度决定了冲突的目标是内部还是外部，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并且罗斯发现，把这两类变量结合起来解释冲突行为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类来解释都要好。

最后，由于罗斯的检验完全依赖于前工业时代的小型社会，那么，他所主张的理论能不能普遍化到现代民族国家呢？换言之，基于前工业社会的理论能否解释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行为呢？罗斯选择了北爱尔兰

兰与挪威这样两个社会来检验他的理论。检验的结果表明，北爱尔兰与挪威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心理文化因素联合起来“形塑”了它们的冲突状况，而且结合这两类因素所进行的解释优于依据任何一类因素所进行的解释。

二

《冲突的文化：比较视野下的解读与利益》一书作为马克·霍华德·罗斯的理论奠基之作，有着两个方面的优秀品质值得一提。

第一，显示了罗斯对于多元学科知识的开放性。在该书中，罗斯综合运用了人类学、心理学、比较政治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并把这些学科的知识很好地糅合在一起。与此同时，罗斯也表现出了其对多元研究方法的开放性。在该书中，他混合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同时把对普遍性理论的关注与代表性个案的分析结合在一起。

第二，通过该书，罗斯带动了比较政治学理论上的重大转型，纠正了以往比较政治学理论对于利益研究的过度关注。传统现实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强调客观利益的分歧对于冲突行为的主导性作用，而罗斯强调，冲突中的个体对于利益的解读才决定了冲突行为的走向与实际发生进程，这实际上强调了文化理论在解释冲突行为中的主导性作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把文化带回来”的运动，重新奠定了文化理论在解释国际冲突与战争中的基础性地位，^[1] 在这一点上，罗斯可谓是一个理论上的先行者。在此之后的文化理论研究者更多的是把文化看作是一套关于意义的体系，这一意义的体系为社会中的个体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认知的模板，从而为解读他人的行为提供了基础。因此，一个社会内部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意

[1] 萨缪尔·亨廷顿在其有深远影响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说，“冷战”结束之后，文明冲突的时代已经来临，文明之间的冲突会成为下一阶段国际冲突的主要形式，请参见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义体系，而且这些不同的意义体系之间易于产生错误的解读。^{〔1〕}

但是，罗斯的这本书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这是读者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

第一，罗斯的论证完全依赖于前工业社会的 90 个小型社会，这 90 个小型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仍然是部落社会，这样的小型社会显然与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么罗斯的理论能否适用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呢？罗斯的结论是可以，他选择了北爱尔兰与挪威这两个案例加以论证，但是这样的论证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为北爱尔兰与挪威是两个规模较小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显然无法代表当代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广大的欠发达的、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诸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罗斯的理论过于强调了早期社会化的经历。在前工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结构比较简单，缺乏其他的社会化手段，所以早期社会化的经历就显得特别重要。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由于国家组织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一些制度化的社会化途径开始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学校、工作场所、媒体、政府操控的意识形态宣传灌输等。^{〔2〕} 诚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早期的社会化经历确实很重要，但是上述制度化的社会化途径开始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政府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有效加强一个社会的向心力，从而把社会中的不同成员凝聚在同一个民族的认同之下。如果政府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有意识地强化对于国外民族的仇恨，就会把这个社会的冲突有意识地引导向国外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所以，对于解释当代冲突的文化心理机制的形成，仅仅强调早期社会化经历是远远不够的。

〔1〕 Patrick Chabal and Jean-Pascal Daloz, *Culture Troubles: Politic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2〕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9.

原著者序

xi*

通常，无论是教科书中有关研究方法的讨论，还是对像本研究这样的某个个别项目的简单描述，都无法展现研究工作的迂回曲折，而这些迂回曲折是随着观点的不断发展、扬弃、提升和完善而出现的。但从事严肃的科学研究或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研究的过程远不像一气呵成的作品所暗示的那样直线前进。本着这种精神，在序言中我要对我的一些预设（assumption）加以评论。这些预设对我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冲突模式至关重要，而且在本书的正文中没有提到。信念的几次飞跃——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知识上的——都非常重要，没有它们，本书就无法完成。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天真地坚信，与过去相比，人类社会能够学会更富有建设性的处理冲突的办法。当然，从事破坏性冲突的能力也会在各个社会扩散，但本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思考富有成效的冲突化解如何得以付诸实践并推广。在我看来，冲突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而且也不是我们能够根除的，问题在于不能有效地化解冲突会让社会与人类付出高昂的代价。

一个美国人希望深入和广泛地探索建设性的化解冲突之道，这一点并不值得惊诧，因为冲突化解本身就是美国社会未能处理好的一个领域。在我的一生当中，美国经历了四场战争，卷入了几十场小规模冲突，而且还为许多纠纷中的一方（有时甚至是双方）提供资金支持。

* 侧边的罗马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为英文原著的页码，下同。——译校者注

xii 在我们国家的内部，各种暴力性的自助策略（violent self-help tactics）与富人和名人更方便使用的法律系统是两种常用的化解冲突的方式。我们的公民都武装到了牙齿，所以毫不奇怪，美国的凶杀率在工业世界遥居榜首。我们的流行文化，无论是职业足球、电影、电视，还是音乐，都是暴力性的，而争端方共同解决问题及进行调解与协商常被看作是软弱的标志。我愿相信必定会有一些社会可以教我们冲突化解的某些办法，这一信念还需怀疑吗？

这种探索也起源于我作为政治科学研究者的一种天真的愿望，即想利用民族志田野数据来跨文化地考察冲突，然后借鉴社会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建构解释性的机制。在不同领域间建立联系会存在大量的潜在风险，不过，探索新的联系并把以前分离的理论与数据结合起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对旧的问题给出新的（也许是改进了的）答案是一件刺激的事情，说服一个领域的人们，使他们相信到另一个领域工作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很重要也是一种挑战。

人类学家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及经济学家伊利·德文思（Ely Devons）（1964）提出的观点证明了以上努力是可取的。他们认为，天真的预设虽然忽视或过分简化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基础，但为了有效地描述许多复杂的问题，它们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让自己能够驾驭某一方面或领域的研究，即对此方面或领域可以说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他常不得不做些在其他学科的从事者看来是歪曲甚至是错误的预设。我们甚至断言，他有责任在这方面天真以至于做出‘外行的’预设，他也有责任避免尝试处理自己的专业之外的学科适合解决的现实问题。”（166）

例如，经济学家在建构微观经济模型时对所选择的心理过程做出简单化的预设，而不去注意心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格卢克曼与德文思认为，如果这种天真的预设并不影响研究者对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做出重要结论，那这种天真并没有问题。“一种公正的检验是询问：如果采用了不同的天真的预设，这种分析是否还站得住脚。”（1964：168）如果答案是“是”，那他们认为所谓的“天真”就证明是合理的。

随着我对此项目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在格卢克曼与德文思的观点中这种简化思维（the intellectual naïveté）变成了我不能再承受的奢侈。如果我继续对人类学、社会学及现代精神分析的数据与理论做出天真的预设，那我对冲突及冲突化解的理解就不可能提高。我不能接受对已变成我所关注的重心的数据与理论做出简单化的预设。例如，若想有效地利用民族志的报告作为基本的资料，就意味着要对人类学田野工作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及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了解得更多。为了能正确地评估把社会化经历与成人冲突行为联系起来的心理文化假设，我在一个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了一年，并试图跟上这一领域的发展，以便能更好地了解此领域有关冲突行为的核心假设及它们对冲突化解的意义。 xiii

当然，所有这些花费了比我原预期要多得多的时间。在 1978 年，我打算花几个月的时间研究前工业社会的样本，然后写一本有关政治人类学的普通教科书。那本书没有写成，逐渐地，冲突以及后来的冲突化解成为我更感兴趣的问题。当我集中精力关注冲突行为时，我分析的焦点也转移了。起初，我的目标是从来源于不同冲突理论的、相互竞争的预测中做出选择，然而，当各种理论的细节及我的数据分析的结果变得越来越清晰时，我越来越开始重视各个理论的互补。我现在认为，社会结构冲突理论主要可以解释当冲突发生时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而心理文化冲突理论能够极好地预测一个社群总体的冲突水平。这些理论不是互相排斥的，确切地说，每一种理论关注冲突的不同侧面，把它们整合起来就变成了一个比单独的理论都更有用的理论。

当我在 1990 年完成了本书的初稿时，它大约有 600 页，不仅包括了本书中已有的大量资料，还有 6 章内容阐述了冲突文化理论对冲突化解的意义。随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冲突与冲突化解间建立必不可少的联系不一定必须在一本书中完成。所以，本书关注的是跨文化视角下的冲突问题，而另一本书《冲突的化解》（也是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则详尽阐述了冲突化解的问题。虽然这两本书绝对是相互依存的，但每一本都是独立的，可以单独来读。 xiv

所有这些都表明，学术研究的过程充满了不可预期的曲折，一些关

键的驱动因素往往不会在发表的作品中说明。学术研究既要求仔细地思考数据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一种意愿去超越已被接受的对现存问题的阐述，以便思考如何用新的方式来理解行为。我希望在本项目中我已做到了这两点，即分析小型社会冲突的数据，并用新的方式使冲突及冲突化解的问题概念化。

多年来，我的这项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鼓励和支持。在我启动这一研究计划之后，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允许我休了几个学术假期，并提供了设备和研究上的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人类学项目（The Anthropolog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1982~1983年的数据收集工作（BNS82-03381）提供了关键支持。1989~1990年间，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为完成数据分析和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慷慨的资助。

在这项研究中，很多人为我提供了特别的帮助。唐·坎贝尔（Don Campbell）、比衣·怀廷（Bea Whiting）和约翰·怀廷（John Whiting）多年来以不同的方式施惠于我，他们是我的老师、导师和同事。他们每一位都鼓励我从各种不同的场景去研究政治学、提出缜密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聚焦于数据和理论的关系。他们一直不吝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为我树立了有关求知欲、诚实和重承诺的榜样。

玛丽亚·卡特尔（Maria Cattell）、辛迪·科内科（Cindy Konecko）和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以及当时布林莫尔学院的学生，他们在1982年夏天对这一项目的民族志数据进行了编码。每位同学在这一项目的研究中均认真周到，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和不同意见，有时还帮助将我们的研究调整到更有效率的方向。我很感谢他们，无论是他们的付出还是他们高质量的工作都值得我铭记在心。吉娜·格拉内利（Gina Granelli）对挪威（Norway）与北爱尔兰（Northern Ireland）现存文献的收集与分析是一流的。

跨文化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的同行在很多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这个小型协会举办的会议，既让人愉悦又能
xv 激发大家的灵感。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不断鼓励我进行系